

张文勋文集 第一卷

中国古代文论与文艺美学

12.1

云南大学出版社
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

《张文勋文集》编委会

顾 问

马 曜 高发元 林超民

吴 松 胡廷武 张毓吉

主 任

施惟达

副主任

蒋永文 段炳昌 管乔中 段跃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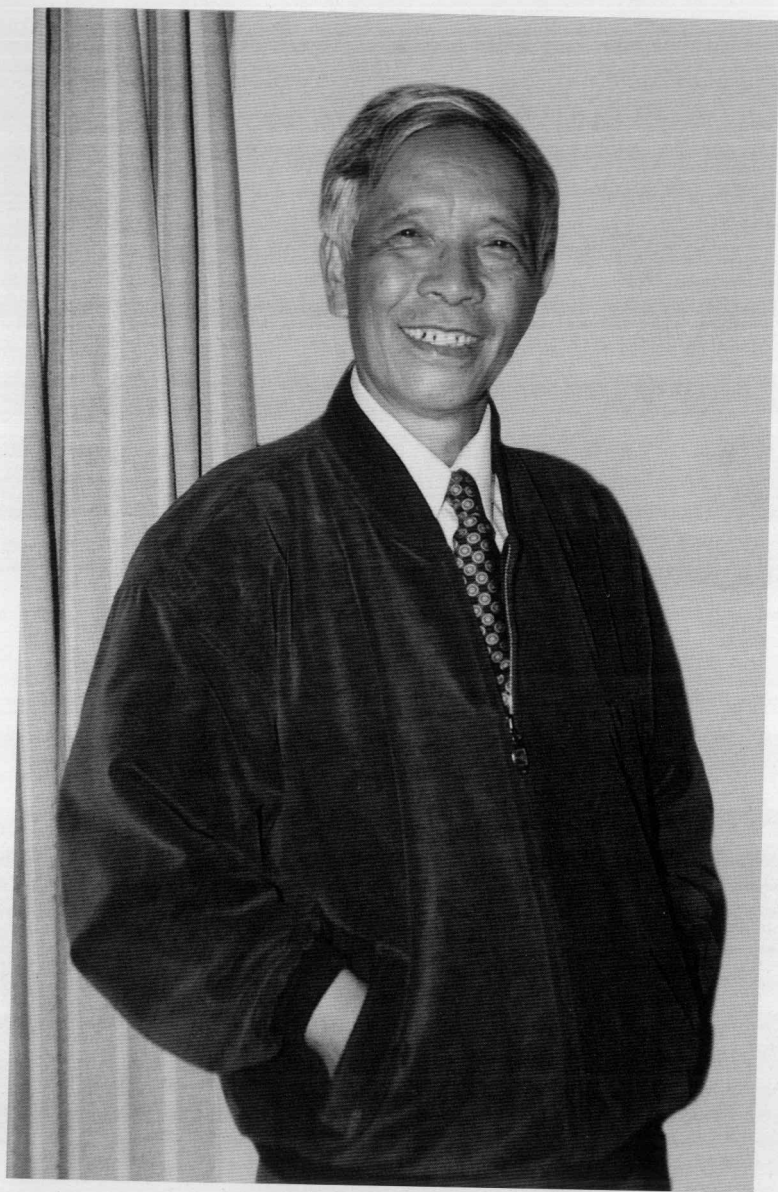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 峨 伍 奇 李生森 朱晓钟

何 明 陈孟炯 张 鹏 张国庆

张胜冰 张晓萍 张德文 黄 泽

曹鹏志 戴 抗



作者近照



青年时代的作者夫妇



家庭合影



与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中）及台湾著名《文心雕龙》学者王更生教授（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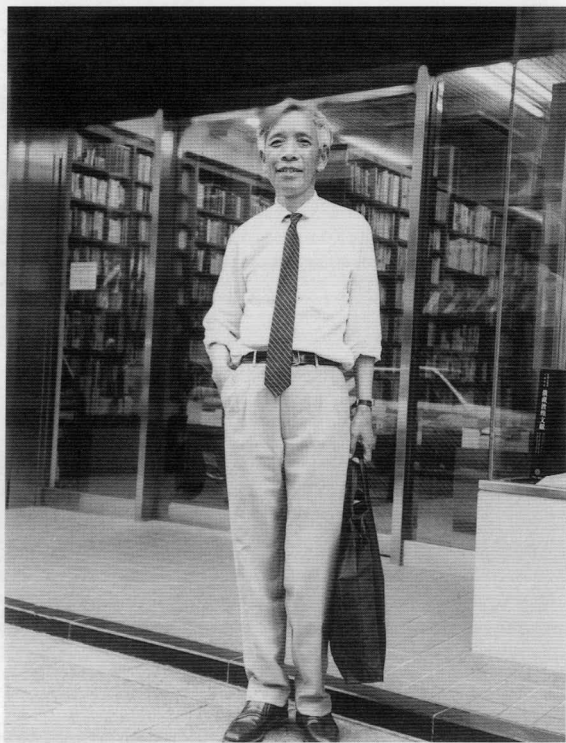


与香港作家联合会主席曾敏之（左）、诗人王一桃（右）合影



指导研究生

在日本东京内山书屋前



永遇樂

淀山湖紀遊

一片汪洋，碧波蕩漾，輕舟東去。

日照中天，雲沈水底，烟繞

湖遠

柳樹。

鷺鷥鶴林立，海鷗翔集，道是魚龍深處。

凝神久，心潮起伏，閒愁夢裡無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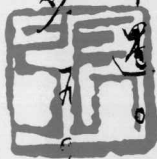
淡曩世界，炎涼天氣，今日喜無風雨。

著力雕龍，以文會友，亟忘詩情絮語。

品嘗魚味，酸甜辛辣，勸客頻頻舉箸。

留人醉，千杯恨少，知音幸甚。

張文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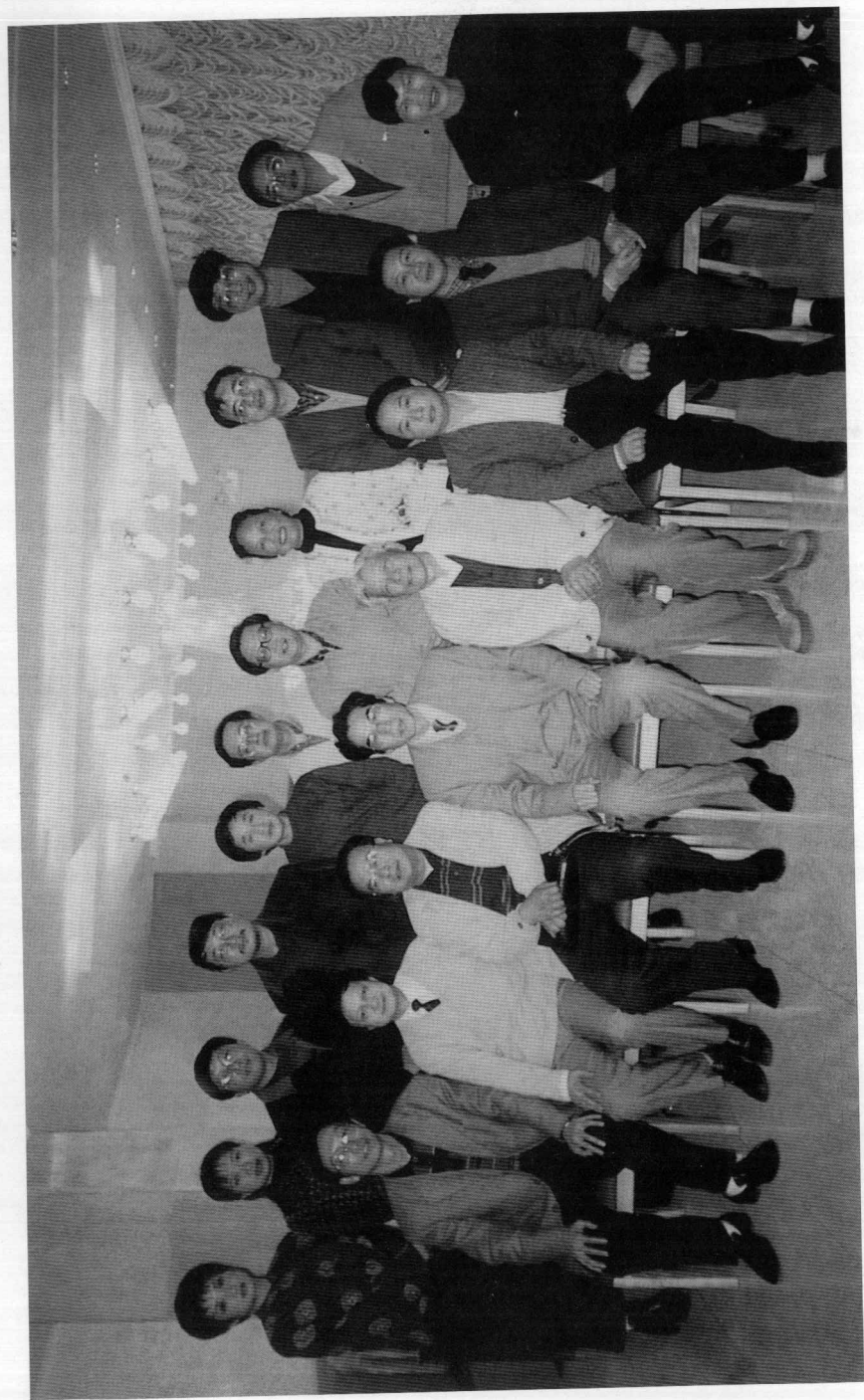
仍笃信佛学，由于他“长于佛理”，故“京师等塔及名僧碑志，必请魏制文”^①。由此可见，刘勰在三十岁左右写《文心雕龙》时，不可能不受佛学的影响。由于刘勰在《序志》及《原道》、《采经》、《征圣》诸篇中，特别强调对儒家的崇教，而对佛学则很少提及，故有的学者认为他的文学思想与佛学无关^②。但有的学者又认为刘勰《文心雕龙》是以佛学为主导思想，是“融佛统儒，佛儒合一”^③。这都有些片面性。其实，佛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理论的影响是深刻的，这并不表现于文字表面是否崇扬佛学，而是在认识论和思维方法上的内在影响。

第一、认识的最高境界“神理”和“道心”，固然是求儒家经典的概念术语，但是，在刘勰这里作为一个文论的专用概念，也并不排除他把

①《梁书·刘勰传》。

②范文澜：“但于《文心雕龙》里，严格保持儒家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渗透。”（《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③马宏山《论〈文心雕龙〉的纲》。



与部分文集顾问及编委合影

前 言

施惟达

我们在新千年的第一个教师节前，编辑这套《张文勋文集》，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是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教授总结其大半生的研究与创作成果，以积累文化、润泽后学，而且这样的一套文集，反映了二十世纪一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历程，他的学术追求、价值选择、人格涵养及审美理想。

张文勋先生，云南洱源人，白族。1926年生于罗平山下凤羽包大邑的一个贫苦农家。白族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在自己丰富的文化创造中，吸取了很多汉文化的成分，有深厚的“诗书”传统。他们把知书识礼，视为“成器”的标准，所以无论生活多贫苦，都会节衣缩食供子弟求学。文勋先生虽自幼家境贫寒，但仍五岁发蒙，上了村中的私塾。或许是生活的磨炼使聪明的孩子早熟，文勋先生自幼十分珍惜读书的机会。他异常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把那难懂的四书背得烂熟，深得师辈赞赏。正是苍洱地区的壮丽风物和子曰诗云一类传统文化的浸润，给文勋先生的一生以深刻的影响。

“五四”以来的中国，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目标下摸索着更新之路。即使在云南的偏远山村，也被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所波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包大邑村成立了第一所公立小学，文勋先生即成为该校的第一班学生。那时他十岁，自此时开始接受新文化。从此，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就共同塑造着这位二

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村中念完小学，文勋先生考入了洱源县立初级中学，之后又入蒙自中学读高中。1945年，转到昆华工校就读。时值抗战胜利、内战又起之年，人们欢庆胜利，情绪高昂，随即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内战、争民主。在时代风暴中，青年学生始终处于前沿。在昆明，更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腔热血的文勋先生积极投入，写墙报、上街头、筹资募捐，在火热的斗争中接受了第一次革命的洗礼。

次年，因慈母年迈，充满孝心的文勋先生又转回家乡的大理省中续读，以便能常回家省视老母，聊解不能晨昏奉侍之疚。

在大理读书期间，文勋先生结识了不少文学师友，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很快，昆明《民意报》副刊发表了文勋先生的第一首新诗，从此他就和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8年，文勋先生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参与主编文艺刊物《平凡文丛》，并积极从事文艺创作。不仅如此，文勋先生还参加了当时云南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火热的斗争生活。生活是创作之源，文勋先生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爱与恨，理想与追求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诗歌、小说、散文乃至杂文表现出来。这一时期，文勋先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作品。

云南起义后，按照党的指示，文勋先生离校到起义部队工作。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云南，起义部队改编，文勋先生又回到云大继续念书。解放初期的云南大学中文系，名师云集。刘文典、李广田、刘尧民、张若名等都以各自的学识文才吸引着莘莘学子。其时又当苏联文学及文艺理论全面传入国内之际，把马列主义奉若圭臬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把苏联的理论当作马列主义的正宗代表。一方面，文勋先生师从刘文典、刘尧民等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感受名师严谨的治学风范，接受校勘训诂的学

术训练和韵文文风的熏陶，深得国学大师、“骈文圣手”刘文典先生的赏识；另一方面，文勋先生又努力掌握新的文艺理论，立志用马列主义的文艺观来指导文学艺术的研究。

1953年，文勋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次年被学校送往北京大学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在这个班上，毕达可夫等苏联文艺理论教师系统讲授苏式文艺理论，而班上的学员，多是全国各高等院校培养的中文系教学骨干。后来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许多知名学者，如蒋孔阳、胡国瑞、王肯、王文生等，都出自这个班。正是在这一时期，文勋先生的主要精力，从文艺创作转向了理论研究。而研究的重点，是当时理论界所普遍关注的对文学的重新认识的问题，如文学的本质问题、特征问题等。由于文勋先生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所以他并不泛泛地、抽象空洞地讨论问题，而总是要从具体的东西入手，这样比较容易得出扎实、独特的看法。文勋先生的这种治学方法成为他的一个特点，贯穿于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是他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经验，也是他常常教诲后学的法门。此期成果，如《从文学艺术的特质去看古典文学作品》等陆续发表于《文艺学习》、《光明日报》、《文史哲》等全国重要报刊，文勋先生也成为文艺理论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人。

同时在这段时期，文勋先生开始阅读《文心雕龙》，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部体大虑周的宏著，不仅以它精深的理论内容，而且以它精美的语言艺术，给文勋先生后来的研究和创作以深刻的影响。

1956年，文勋先生在北大学习结束，返回云大继续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此时文艺理论界讨论的重点，在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问题。文勋先生自然也围绕着这样一些重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今天的观点审视，这些论文除了具有当时特有的一些语言表述模式外，文勋先生总是力图

作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发表一些不同于别人的见解。而且文勋先生总是忘不了把目光投向古典，既拓展了研究领域，也每有新意脱出。如写出了《关于古典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的一些问题》等，体现了文勋先生一贯的研究风格。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下，文勋先生率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到大理进行调查。文勋先生以满腔的热忱投入这项工作。在家乡调查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他感到由衷的自豪。在调查的基础上，文勋先生主持编写了近40万字的《白族文学史》（初稿），书稿于196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中较早的一种。它体例完备，内容翔实，出版后受到广泛好评，并于1983年修订再版。这也是文勋先生继早年研究过白族民俗和民歌后，再一次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工作。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在上级组织的群众性活动中，寻找到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做出扎实的成果，而不致使时光在表面的闹热中荒废，这是有所成就的人必须具备的本领。虽然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文勋先生一步一个脚印在学术的道路上跋涉着。

1960年，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文学家艺术家代表大会，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文学艺术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文勋先生躬逢盛会，亲身感受到那种群英聚会，奋发向上的气氛，倍受鼓舞。回校后，愈加勤奋地工作。那时，白天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读书与写作只能在夜晚进行，故常常通宵不眠。数年间，不断有论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在“双百”方针的指引和毛泽东本人的倡导下，形象思维、美学、古典文学理论等都成为理论界的热点。文勋先生发挥所长，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宝库中发掘思想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观作分析，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文勋先生以炳章的笔名发表在《光明日报》讨论刘勰文学观的哲学基础的论文，是解

放后较早正式发表的刘勰研究论文之一，这也是文勋先生取得斐然成就的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的第一篇。此期，文勋先生不仅搞古典，他对文学界的现状也很关注，写了一批对当时一些文艺作品的评论。

正当文勋先生雄心勃勃，要系统研究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理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整整十年，文勋先生极富创造力的十年被荒废掉，还不说这十年间给文勋先生带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面对这种民族性的灾难，文勋先生对民族的优秀传统并未丧失信心，只要有可能，他仍于陋室中偷偷阅读禁书，抄写《说文解字》，同时，也写作古体诗，以隐晦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复杂情感。

“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到来了。文勋先生以加倍的热情，投入新时代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于思想的解放，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大大增加，文勋先生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研究精力，集中于自己所感兴趣的古代文学理论与美学上。从研究方法看，包括文勋先生在内的新时期的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者，都在进行着几个方面的突破。首先是不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贴标签式的方法来谈某一理论家（主要是给其贴上某阶级、唯物唯心的标签）；第二是不再用某种搬来的理论，几个固定的概念来套我国古代的理论，如典型理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勋先生要从研究对象自身出发，尊重研究对象自身的特点，探求研究对象自身的规律。针对很多人忙于引进西方的理论，看不起自己古代的遗产，认为它零碎、缺乏体系的状况，文勋先生要爬梳我国传统文艺美学内在的思理，显示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突破是一个过程。先是对一些习见之论的再认识。如把文学理论从文学批评的范畴中区分出来。然后是让“左倾”思潮下长期被忽略甚至视为禁区的人物和理论进入研究的领域，如老子和庄子，佛学及受其影响的理论等。文勋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以《文心雕龙》为核心的六朝文艺与美学理论的研究；一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研究；一是佛家美学思想的研究。十多年间，共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钟嵘的诗歌理论》、《文艺必须给人以美感——论严沧浪的“兴趣”说》、《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之原因》、《古代文论民族特色三题》、《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审美心理结构》、《佛学对我国古代美学的影响》、《老庄美学思想中“有”和“无”的辩证法及其影响》、《论意境的美学内涵》等等。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形象思维散论》、《文心雕龙简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论稿》、《刘勰的文学史论》、《诗词审美》、《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等。尤其是后三部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诗词审美》以古代重要的审美范畴为经，以诗词名篇为纬，融理论阐述、作品分析、鉴赏品评于一炉，语言生动，深入浅出。书出后大受欢迎，被《书讯报》评为当年读者最喜欢的十本沪版新书之一，是当时出得很多的古代诗词鉴赏书中的佼佼者。这是文勋先生对使古代文学理论与当代审美相结合所作出的成功努力。

《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站在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从儒、道、佛三家又区别又融合的宏观层次上研究微观美学理论的传承变化，可谓独辟蹊径，打开了古代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局面。为此，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书评加以肯定。

《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一书，文勋先生更从两方面深化了研究的命题：一是把古代美学理论的背景从哲学思想的层次深化为文化心理的层次，一是从审美概念的层次深化为审美意识的层次。文勋先生集多年的研究，从总体上对华夏文化的民族特色及在这一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古代文艺美学的发展、规律与特征作了

一番梳理，提出了很多富于创见和启发性的观点，是文勋先生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从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勋先生是一位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尤其对佛、道思想中深刻合理的内涵给予着力的阐发。但他决不是一个抱残守缺、拒绝新观念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文勋先生从来是一个胸襟开放的学者，他不断学习新知识，吸收新观念、新方法，力图使自己的研究富有时代的气息和特点，对建设新文化有所裨益。比如，对古代审美心理结构的研究，就是一例。文勋先生应用新的审美心理学的理论，结合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相关思想，总结出我国古代的审美心理结构，即心物感应的审美心理基础，情志合一的审美判断，兴会神到的审美活动。这对当代审美文化与文学艺术创作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此文发表于《文学评论》，并受到多家报刊的引用，还被摘编入当年的中国文学年鉴。

就在我们编辑这部文集的时候，文勋先生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文心雕龙研究史》也脱稿了。这是文集中唯一一部尚未公开出版过的著作。这部著作汇集了海内外《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资料，用编年史的方式对历代研究情况作了翔实的介绍评说，对了解《文心雕龙》、研究《文心雕龙》都是一部极好的参考书。这是文勋先生长年进行《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扎实的基础工程，是文勋先生对《文心雕龙》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贡献。“龙学”研究者都非常欢迎这部书的问世。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文勋先生除在古代文化和文艺美学的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外，在旧体诗词创作上也是成绩斐然。1995年就出版了作品集《凤樵诗词》，收诗词作品五百余首。近年来更吟咏不辍，创作兼及楹联、碑记等古文体。对文勋先生来说，诗词创作决非茶余饭后之事，而同样是一桩事业，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勋先生常说，搞中国古代文化